

從歷史語言學看漢語音韻學的研究

李壬癸*

摘 要

本文主要在說明這幾個基本概念和方法：(1) 語言演變是正常的現象，不必尊古薄今；(2) 漢語音韻學與漢語方言研究的關連；(3) 漢語上古音和中古音的構擬都是採用內部構擬；(4) 音變的主要類型（合併、分化、消失、新增）；(5) 語言歧異與祖居地；(6) 尚有待進一步研究的相關研究議題。漢語音韻學是歷史語言學研究的一部份，對於歷史語言學有良好掌握的學者有助於提升其漢語音韻學的研究品質。過去對於聲韻學有重大貢獻的學者全都對於歷史語言學有深刻的瞭解。

關鍵詞：音變、構擬、分支、歧異、上古音、同源詞、祖居地

2020.09.04 收稿，2020.10.07 修訂稿收件，2020.10.14 通過刊登。

* 中央研究院院士、中央研究院語言學研究所兼任研究員

漢語音韻學既然是研究漢語音韻史，它就是歷史語言學的一部份。因此有關歷史語言學的智識是絕對不可缺少的。然而從事漢語音韻學研究的學者未必都具有相關的知識和背景，不無遺憾。過去對於漢語音韻學有重大貢獻的學者對歷史語言學都有深刻的瞭解，包括高本漢、李方桂、王力、羅常培、董同龢、龔煌城、Yakhontov、Pulleyblank 等語言學家。

本文試從歷史語言學的角度來檢討漢語音韻學若干重要的研究課題，¹ 希望對後來的學者有一點助益。

一、語言演變

語言隨著時間演變是正常的現象，不必尊古薄今，誤以為越古的越正確。明、清時代的漢語音韻學者大都誤以為上古時代的才是原來正確的漢語，《切韻》時代的系統凡是不合上古音的都是錯的，都得要改正，例如，顧炎武的《唐韻正》、《韻補正》、《近代入聲之誤》，江永的《古韻標準》，江有誥的《唐韻四聲正》。明朝陳第（1606）在他《毛詩古音考》序文中首次提出音變是自然的觀念：「蓋時有古今，地有南北，字有更革，音有轉移，亦勢所必至」，其時代比歐洲那些文獻語文學家還要早的多。

二、漢語音韻學與漢語方言研究

漢語音韻學，上古音和中古音系統的構擬基本上都是採用內部的構擬（internal reconstruction），並非外部的構擬（external reconstruction）或比較方法（comparative method）。如果以現代各種漢語方言的材料，採用比較方法去構擬共同的古語，許多現象都已消失，無法復原。自從高本漢以來，學者都是採用《切韻》系統的韻書和等韻圖的材料來構擬中古音系統，只不過是根據現代各種漢語方言對那幾類聲母和韻母的反映，填入了實際的音值罷了，這些都是內部

¹ 本文初稿曾於 2020 中華民國聲韻學學會會員大會暨學術演講會做專題演講，東吳大學，2020 年 8 月 9 日。丁邦新、何大安、洪惟仁、吳瑞文四位教授曾提供寶貴的修改意見，使本文內容更充實，減少錯誤，特此致謝。

的構擬。研究上古音也只根據《詩經》的押韻和諧聲這兩種材料（並且參考明、清兩代音韻學者的研究成果），再從中古音系統向上推上去，仍然是內部的證據，並不涉及比較方法。李方桂先生的〈上古音研究〉，雖然他從少數民族語言的現象得到一些線索，但是他卻完全根據內部的證據建構他的上古音系統。

一般研究漢語方言的學者，大都拿《切韻》的系統來做比較，形同把《切韻》系統當作現代各種漢語方言的共同祖語。這種作法有如研究古印歐語的新語法學家（neogrammarian）那一學派的做法一樣，難免有僵化和守舊之嫌。更嚴重的問題是，閩語在《切韻》時代之前就已經分化出來（Ting 1983），這種做法有如拿一個支群的語言跟另一個支群的語言做對比研究一樣，而不是真正在做語言傳承上的演變研究。

三、音變的類型

音變的主要類型包括從一個語音變成另一個語音、合併、分化、消失、新增。從一個語音變成另一個語音，例如從重唇音變成輕唇音（如 $p > f$ ），從舌尖前音變成舌尖後音（如 $t > t'$ ），從央中元音變成低元音（ $\text{ə} > \text{a}$ ）。

語音合併包括兩種不同的類型：完全合併和部分合併。例如，全濁聲母清化，除了吳語方言以及部分老湘語婁底、雙峰、邵陽的濁聲母沒有清化之外，其它漢語方言都已清化。有些漢語方言（如一些新湘方言）幫母和並母合併，端母和定母合併，見母和群母合併，精母和從母合併，心母和邪母合併等等，這些都是完全合併。然而，許多其它漢語方言卻是部分合併，依聲調為條件：平聲送氣，仄聲不送氣。如此一來，平聲的並母與滂母（送氣）合併，而仄聲的並母與幫母（不送氣）合併；餘此類推（詳見楊秀芳 1989）。又如現代北方官話輔音尾的 $-m$ 都已變成 $-n$ ，這也是部分合併，因為鼻音聲母 m -、 n - 仍然分立，只有輔音尾的 $-m$ 、 $-n$ 才合併。又如，較早期的諧聲時代還有收 $*-b$ 尾的音節，如「內」和「納」諧聲，收唇音尾，到稍晚的《詩經》時代 $*-b$ 尾變成了 $*-d$ 尾（Karlgren 1940：29），因此 $*-b$ 跟 $*-d$ 合併了，但是聲母 $*b$ - 和 $*d$ - 並沒有合併。又如上古的央元音 ə 大都保持不變，但是屬於二等字的到了中古

大都變成了低元音 *a*，而跟原來的低元音 **a* 合併了（李方桂 1971）。

語音分化，例如聲調之分陰陽，從平上去入四聲變成八個聲調：陰平、陽平、陰上、陽上、陰去、陽去、陰入、陽入。又如上古的舌尖音到中古分化為舌尖前音和舌尖後音，唇音到中古後期分化為重唇音和輕唇音。李方桂先生所構擬的上古音只有四個元音，因為受到了介音 **r* 的影響，到了中古就變成十幾個不同的元音了。以上都是同一個語音在不同的語境分化為不同的語音。

語音消失也包括完全消失和部分消失兩種不同的類型。例如高本漢所構擬的上古音含有複聲母 **kl-*、**khl-*、**gl-*（二等字李方桂先生改為 **kr-*、**khr-*）、**sl-*、**sm-*、**sn-*、**st-* 等等，李方桂先生（1971）也擬有複聲母 **sk-*、**skh-*、**sg-*、**sgw-*、**sng-* 等，後來都簡化為單聲母了。又如上古音二等字有介音 **-r*，古閩語就已經完全消失了，不像其它漢語方言，它促使舌尖前音變成舌尖後音，因而到了中古音知、徹、澄便與端、透、定分化成兩套不同聲母了；因為古閩語 **-r* 介音丟失得早，才沒有造成端、知之分化。又如上古音歌部字，李方桂先生擬作收 **-r* 尾的，大約在兩千年前（兩漢之交時）大都丟失了，只有一小部分留下了痕跡：即含有 **-j-* 介音的三等字，後來變成中古的支韻字 **-r > -i*（參見 Ting 1975 : 239）。古閩語也是如此，屬於上古歌部的三等字如寄（**kjarh > *kiai*）、倚（**gjarx > *giai*）、倚（**ʔjarx > *ʔiai*）、蛇（**djar > *dziai*），也都有 **-r > -i* 的演變（吳瑞文 2007 : 285）。古漢語輔音尾 **-r* 的丟失跟古閩語的丟失介音 **-r-*，時代大概大致上相同。除此之外，古漢語曾經發生了 **l > i-* 和 **-r > l-* 這一連串的音變，時間也是在漢代（Schuessler 1974、龔煌城 1990）。這就是說，在漢代古漢語的 **r* 在不同的位置發生了不同的演變：聲母（音節首）**r-* 變成 *l-*；介音 **-r-* 丟失（閩語）或造成舌尖後音（其它漢語方言）；韻尾 **-r* 大部分丟失，只有三等字變成 *-i*。由此可見語境非常重要，同一個語音在不同的語境常會有不同的音變，這就是一個很好的例證。古漢語的丟失輔音尾 **-r*（歌部）跟丟失介音 **-r-* 既然都發生在大約兩千年前（兩漢之交時，Ting 1975 : 239、1983），聲母的 **-r > l-* 音變大概也在同時發生，那麼更早的音變 **l > i-* 應當西漢時代（有可能在公元前）就已發生了。

無中生有的演變較為罕見，但是也有。現代漢語「糊里糊塗」中的「里」

大概是後來才產生的無意義的語音。古南島語 *batu「石頭」，在泰雅語汶水方言變成了 batu-nux，其後綴 -nux 是後來才產生的，大概是男性語言所添加的（參見李壬癸 1983）。

以上幾種音變的類型當中，以部分分化和部分合併最為常見。也就是說，一種語言的語音總數不會太多，也不會太少，大致維持一定的數量。

四、語言歧異與祖居地

Sapir (1916) 曾提出這樣的概念：語言最紛歧的地區最有可能是該民族或語群的祖居地 (homeland)。越早分裂的語言，彼此之間的歧異也越大；反之越晚分裂的語言，彼此之間的差異也越小。並且，越早分裂的語言距離祖居地越接近；越到後期的擴散，距離祖居地也就越遠。例如，閩語最紛歧的地方就是同時具有閩北、閩東、閩南方言的地區（在今福建西北部），這也就是閩語的擴散中心。泉州、金門、臺灣、廣東、海南島都只有閩南方言，都是較晚期的擴散。

古漢語是在華北黃河流域，可是現代漢語方言華北地區的同質性很高，華南地區的方言反而紛歧得多，這種現象看起來好像跟 Sapir 的理論有所抵觸。² 語言的現象固然有部分是從祖語 (parent language) 傳承而來，但是也有的是因為語言接觸所產生的結果。元朝以來，歷代王朝都建都於北京，因此北方官話一直具有政治和經濟上的優勢，它逐步擴散，取代了華北地區的其它較弱勢的各種漢語方言，這應是不爭的事實。根據西漢揚雄所寫的《方言》，約在二千年前或稍早，華北地區的漢語方言相當紛歧，詞彙有很多不同，語音也有很大的差異（參見王力 1981：20-29）。我們得要注意時代的差異，不宜以現狀替代古代的實際狀況。

² 1979 年我在臺灣大學公開演講（由丁邦新主持）〈從語言學的證據推論台灣土著民族的來源〉（李壬癸 1979），引用 Sapir 這種理論。屈承熹教授就提出了漢語方言的反證，當時我並沒有什麼好的解釋，事隔四十年我才想到了可以有下面所說的較能令人滿意的解釋。

五、有待進一步研究的相關課題

漢藏語系的比較研究近數十年來才有比較可靠的進展。一般都認為原始漢藏語有這兩大分支：漢語、藏緬語。分群必須要有共同的演變為依據。漢語、藏緬語這兩個分支各有什麼共同的演變不見於別的支群？這一方面的證據目前仍嫌薄弱。因此，漢藏語系的分支問題仍有待進一步研究。

龔煌城的原始漢藏語比較研究基本上都採取漢語和藏緬語兩大分支，除了古漢語之外，他以書面藏語、書面緬語、西夏語這三種古文獻資料來鑑定這兩大分支之間的同源詞及其語音對應關係。

原始漢藏語的時代很早，大約在五、六千年前，同源詞（Gong 1995）只有金、銀，而沒有銅、鐵；商周時期（三千多年前）才有大量的青銅器，周朝末期（兩千多年前）才開始有鐵器（Chang 1977：366）。同源詞含有的動物包括牛、馬、羊、象、熊、狐、羌、貔（豹）、麇（鹿），植物包括「楊」、「樺」。這些野生動物（牛、馬、羊那時可能已馴服）和植物多見於中國西南部及其鄰近地區，漢藏語系語言最紛歧的地區也是在這一帶。因此，原始漢藏語的祖居地最有可能是在這一帶。親屬稱謂的同源詞有「舅」和「甥」而沒有「叔」、「伯」或「侄」，有「婿」而沒「媳」，顯示那是母系社會。同源詞含有人工栽培植物包括「穀（稻米）」、「糲」（糙米）、「芋」以及跟農作相關的語詞如「播」、「簸」，顯示那已是半農耕的社會型態，而不只是漁獵、如「罟」（漁網）、「弋」（箭）。已有「紡」、「織」、「補」、「綴」等詞，顯示他們那時已有衣服蔽體。有「薪」、「炭」、「火」、「燔」（烤熟）等同源詞，顯示他們會用火取暖、烤或煮熟食物，可以避免因生吃感染病毒而生病。隨著同源詞鑑定的進展，還有不少原始漢藏語的史前文化值得我們去探討。

引用文獻

一、傳統文獻

〔明〕陳第撰，《毛詩古音考·四卷》（音韻學叢書），臺北：廣文書局，1966年。

二、近人論著

王 力，1981，《中國語言學史》，大同：山西人民出版社。

吳瑞文，2007，〈共同閩語 *iai 韻母的擬測與檢證〉，《臺大中文學報》27：263-292。

李方桂，1971，〈上古音研究〉，《清華學報》新 9.1/2：1-61。

李壬癸，1979，〈從語言的證據推論臺灣土著民族的來源〉，《大陸雜誌》59.1：1-14。

李壬癸，1983，〈兩性語言的差異及其起源問題〉，《大陸雜誌》67.2：40-46。

楊秀芳，1989，〈論漢語方言中全濁聲母的清化〉，《漢學研究》7.2：41-74。

龔煌城，1990，〈從漢藏語的比較看上古漢語若干聲母的擬測〉，《西藏研究論文集》3：1-18。重刊於《聲韻論叢》1：73-96，1994年。

Chang, Kwang-chih. 1977. *The Archaeology of Ancient China*. New Haven &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Gong, Hwang-cherng. 1995. "The system of finals in Proto-Sino-Tibetan." *The Ancestr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Monograph Series 8), ed. by William S-Y. Wang, 41-92, Berkeley: 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Karlgren, Bernhard. 1940. *Grammata Serica: Script and Phonetics in Chinese and Sino-Japanese* (Bulletin of the Museum of Far Eastern Antiquities 12). Available online at <https://archive.org/details/Bulletin12/mode/2up>

Sapir, Edward. 1968. "Time perspective in aboriginal American culture: a study in method." *Selected Writings of Edward Sapir in Language, Culture and Personality*, ed. by David G. Mandelbaum, 389-467,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1916.)

- Schuessler, Axel. 1974. "R and L in Archaic Chinese." *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2.2: 186-199.
- Ting, Pang-hsin. 1975. *Chinese Phonology of the Wei-Chin Period: Reconstruction of the Finals as Reflected in Poetry*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Academia Sinica, Special Publications 65). Taipei: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Academia Sinica.
- Ting, Pang-hsin. 1983. "Derivation Time of Colloquial Min from Archaic Chinese." *Bulletin of the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BIHP)* 54.4: 1-14.

參考文獻

董同龢，1968，《漢語音韻學》，臺北：廣文書局。

中央研究院語言學研究所

paulli@gate.sinica.edu.tw

Studies of Historical Chinese Phonology as Seen from Historical Linguistics

*Li, Paul Jen-kuei**

Abstract

This paper contains the following basic concepts and topics: (1) linguistic change is natural, and language at an earlier stage is not necessarily more accurate than at a later stage; (2)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istorical Chinese phonology and studies of Chinese dialects; (3) reconstructions of Ancient Chinese and Archaic Chinese phonology are generally based on internal reconstruction; (4) types of sound change (merger, split, loss, and new addition); (5) linguistic diversity and the homeland or centre of dispersal; and (6) topics for further studies, such as subgrouping and the Sino-Tibetan cognates which shed light on the cultural history of proto-Sino-Tibetan. Historical Chinese phonology is a part of historical linguistics, so scholars who are well versed in historical linguistics can do a better job studying historical Chinese phonology.

Keywords: sound change, internal reconstruction, subgrouping, diversity, Archaic Chinese, cognate, homeland

* Academician, Academia Sinica; Adjunct Research Fellow, Institute of Linguistics, Academia Sinica

